

商周铜易研究

曹 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市 100871)

关键词: 铜易 形制 组合 分布 族属 分期断代意义

KEY WORDS: Bronze yang Style Assemblage Distribution Ethnicity Significance in dating and chronology

ABSTRACT: Bronze yang is one type of instruments attaching to lacquered shield through its drilled hol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nalyses of numbers of issues related to this type of artifacts, Such as its context with other paraphernalia, distribution, ethnicity, and chronology, in order to show changes on its styles and usag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assemblage of ge dagger and yang was adopted initially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by western communities most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ethnic groups with ji-clan name. This practice flourished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vanished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y. Once this assemblage appeared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other accompany relics should be post-dated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有一类“铜泡”,形制多为圆形,中部隆起,有沿且沿上多有穿孔。由于该类器物有自铭,一些学者结合铭文和文献材料将其定名为“易”,并指出其基本功用^[1]。本文则主要从考古材料出发,力图通过铜易形制、组合、分布地域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其在商周时期发生、发展与流布过程,以及在分期断代上的意义。

一、铜易的类型

铜易是一种通过沿面上的钉孔装配在漆木盾上的器物,根据其形制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型:

A型 圆形圆顶易。圆形,有沿,中部隆起,直径基本在7.5~15.3厘米,以10厘米左右最为多见。沿上或有两组对称的钉孔,每组1到2个;或有三组等分的钉孔,每组也是1到2个;也有个别的只有一组钉孔,或为不规则分布的几个钉孔,甚至有的顶部正中还有一钉孔,用于固定。钉孔的形状多为圆形,也有方形或长方形的,还有极个别菱形的。如:西安少陵原M145、M193、M228等,均为方形钉孔;M225易除沿上钉孔外,顶的正中部还有一方形钉孔;M234易顶正中部为菱形钉孔^[2]。A型易数量较多。依中部隆起的不同,可分为三个亚型:

Aa型 中部圆形隆起呈覆钵状。数量占A型

易的绝大多数。标本:西安少陵原M137:1(图一1)。

Ab型 中部呈两层隆起。数量较少。标本:西安少陵原M255:8(图一2)。

Ac型 中部呈三层隆起。数量较少。标本:宝鸡茹家庄BRM1乙:140^[3](图一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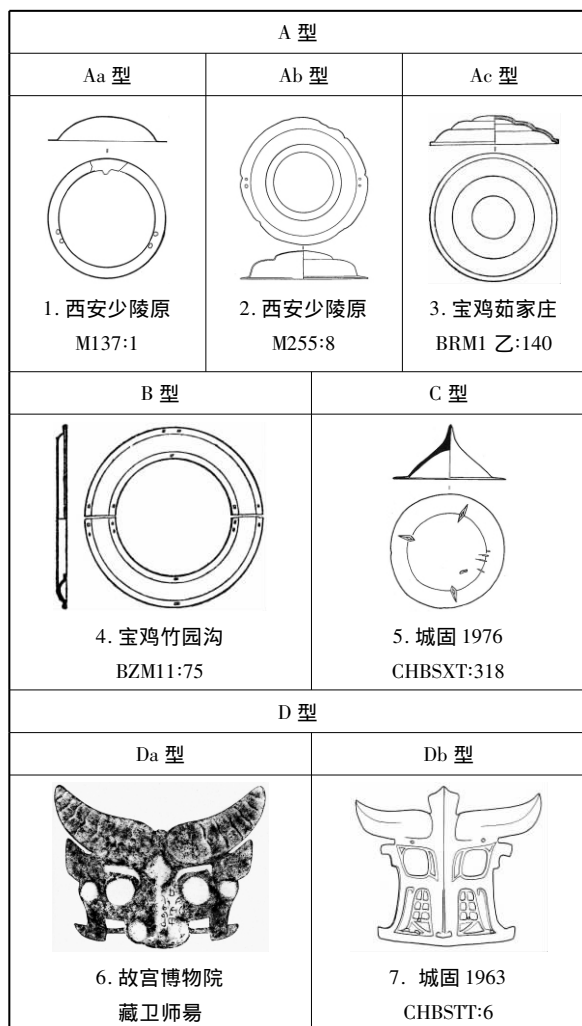
B型 在A型易的外围配有两个半环形饰,合并作一个圆周,固定在木制盾牌的中部。两个半环内外沿各有二或三组钉孔,每组2个。形制较大,外径一般都在35厘米左右。数量较少,均出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标本:宝鸡竹园沟BZM11:75(图一4)。

C型 圆形尖顶易。中部隆起呈尖状,沿上有钉孔,直径在10厘米左右,形制单一。数量较多,但是出土地点相对集中。标本:城固1976CHBSXT:318^[4](图一5)。

D型 兽面形易。整体呈兽面形,眉角粗大,似牛角,眼部圆鼓,一般在耳部、眼角上或额头有钉孔。依面部的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Da型 面部较宽,数量较少,多出在高等级墓葬中。标本:鹿邑太清宫M1:519^[5]、故宫博物院藏卫师易^[6](图一6)。

Db型 面部较窄,嘴部较突出且所占面积较大。数量较多,但是出土地点相对集中。标本:城固1963CHBSTT:6(图一7)。



图一 铜盾易类型图

二、铜易、铜泡辨析

由于铜易,尤其是 A 型和 C 型易与很多铜泡在形制上类似,故两者常被混淆,在不少考古发掘报告中不加区分地统称为铜泡。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得到合理认识,有必要对两者形制以及功用上的差别做一辨析。

A 型易是最易与铜泡混淆的一类,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其在周初不仅自铭为易^[7],而且出土状况也能为其提供直接证据。1973 年岐山县贺家村发掘一批西周墓葬,在发表的简报中介绍 M5 的铜易时提到“出土时周围有漆盾残迹”,在介绍其他易时指出“有的圆泡居中央位置”^[8]。宝鸡獠国墓地是 1974~1981 年期间发掘的一批

保存状况较好的西周墓地,报告在介绍竹园沟墓地 8 座墓葬出土的盾牌铜饰时指出“盾牌用木板作成,放置在二层台上的盾牌木痕尤为清楚,部分还保留有黑褐色漆皮……上狭下宽呈梯形。所出二十五件盾牌上均有铜盾饰”^[9]。此外,在凤翔南指挥西村 79M37^[10]、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华县东阳 M7^[11]等出土的易,均有类似现象。可见 A 型易为装配在漆木质盾牌中央的器物无疑。至于装配方式,应是钉在盾牌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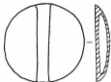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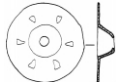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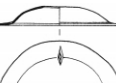
然而与 A 型易类似的有三种铜泡,最易与之混淆,细辨之在形制结构、体量及功用上都有不同。

首先要说明的是一种无沿或沿较窄的铜泡,其背面均有一条梁或十字形梁。这类铜泡体形多较小,一般直径在 5 厘米左右,少部分直径达到 10 厘米左右(图二 1、2)。此类铜泡一是背部横梁限制其在漆木盾上装配,有的梁,特别是十字梁甚至凸起;此外,它们多与车马器同出。这类铜泡可能多为车马器,曹玮在其文中也有涉及,本文不再赘言。但是,这类小铜泡还有其他的用途。甘肃于家湾 84CYM60 出有 24 件这样的铜泡,直径在 3.5~4 厘米,无沿,背面有一条梁。这 24 件铜泡均出自墓主人腰及两腿之间,排列有序,且泡面大多留有布纹痕迹,报告推测其为衣袍上的装饰品是正确的。因此,泡饰看似不起眼,但是常常会有不止一种的用途。第二种铜泡形制与我们上述的铜易基本类似,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隆起部分的背面有一个或两个钮(图二 3)。其中绝大多数体形较小,直径在 5 厘米左右。由于多与车马器同出,用途可能也与车马器相关。这在殷墟还有出土材料可以证明。如《小屯》报告的北组墓葬中,有 5 座报告中称为车墓^[12]的出有大量此类铜泡,其中 M20 的发掘经过中讲到,“……中部为舆,由许多铜泡组成一个簸箕形,在这个簸箕形内有许多的红土,当时叫它为‘红漆片’,颜色如同朱砂的样子,把许多器物都埋在里面了,并有许多朽木”。这些铜泡有的正面隆起部分浮雕有兽面纹,有的浮雕有七角星纹,报告中对其出土形状还进行了复原^[13]。可见,它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为车舆上的装饰。此外,这类铜泡中还有许多直径在 10 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但是简单地从装配方式上分

析,有钮需要用皮条或者绳线之类的固定,装在漆木盾的中央似乎不易固定,更难以发挥防护的作用。从出土材料看,宝鸡虢国墓地 BZM1 出有 8 件大铜泡,直径达到了 12.5 厘米,背壁均有双钮。一件壁内有铭文“𠄎”,其他的折沿处亦有同样铭文(图二 4)。该器自铭为“𠄎”,但是该字与“易”差异较大,很可能不是铜易。而与此同时,在甘肃崇信于家湾 84CYM42、82CYM2 出土的 2 件此类铜泡的表面均有丝织物痕迹。因此,此类铜泡是否为衣物上的装饰?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第三种是与 A 型易形制接近的一种透顶铜泡,只有隆起顶部正中空透与其他不同。这类透顶铜泡也有一类体形较小,直径在 5 厘米左右(图二 5)。在出土时,穿孔内多有细线缝缀痕。宝鸡虢国墓地发现有多例,而且 BZM14 出土有 15 件,不仅“平沿内侧有丝织物痕迹,小孔间有细丝线缝缀痕”,“出在棺内下肢部分排列有一定规律,似为袍服上的装饰”^[14]。因此,此类透顶铜泡可能多为衣袍上的装饰物。透顶铜泡中还有一种形体较大,直径达到了 10 厘米左右(图二 6)。此种铜泡在商代晚期集中出土在陕南的城固和洋县一带,西周时期洛阳北窑^[15]、北京琉璃河^[16]和宝鸡虢国墓地也有出土,不过有的形制略有区别。如:琉璃河 M1193 出土 3 件透顶铜泡,直径达到了 14.3 厘米。形制与城洋地区最大的不同是正面有凹入的环沟,背面有等距离的 3 个钮。由于其透顶的圆心部分镶嵌有一颗绿松石,因此其他的透顶铜泡透顶处可能也镶嵌绿松石之类的饰物。该铜泡由于出在东二层台铜冑北侧的漆皮之上,简报推测为皮甲上的饰物。宝鸡虢国墓地 BZM4 也出土 2 件透顶铜泡,直径为 12.8 厘米,沿上有对称的两组钉孔,与其他透顶泡形制不同之处在于正面双层隆起。同时,这 2 件铜泡与 B 型易同出于椁内外棺盖上,周围再无其他嵌在环形盾饰内的铜易出土,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此类器物作为铜易的可能。但是,从顶部通透并镶嵌绿松石的现象看,它们并不适合用于实战,此类器物或只用于礼仪性场合,或许用途和小型透顶铜泡类似,为衣袍或铠甲上的装饰。

B 型和 C 型易形制单一,较易区分。前者只出土在像宝鸡虢国墓地 BZM7、BZM1、BZM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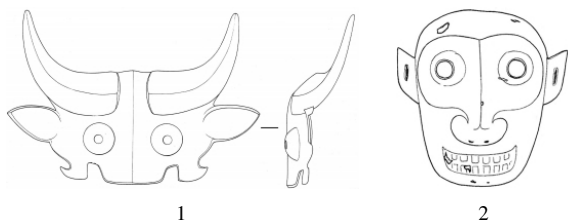
BZM11、BZM20 以及浚县辛村 M42 等这样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后者出土地点相对集中,限于陕西境内,在城固、淳化黑豆嘴^[17]、西安老牛坡^[18]有出土。

带梁圆顶铜泡	带钮圆顶铜泡	透顶铜泡
		
1. 崇信于家湾 84CYM60:5	3. 华县东阳 M64X4:2-1	5. 崇信于家湾 M38:13
		
2. 华县东阳 M1:4-1	4. 竹园沟 BZ M1:115 内壁铭文	6. 城固 1976 CHBSXT:361

图二 铜泡形制图

传世的 2 件 Da 型易均有自铭。一件曾著录在《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其右侧眉角处有铭文“卫师易”。另外,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形制与之接近,只是眉角上翘不太明显,鼻梁右侧有同样的铭文“卫师易”。这 2 件仅见到拓片,具体形制并不清楚,但是从拓片上可以看到嘴角两侧均有长方形穿孔。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也出土有 6 件与之形制相同的器物,出土时背面都沾有木漆器痕,原报告也推测可能为盾牌上的饰件。由于有自铭,又有考古发掘的现场迹象,因此此类器物也为铜易无疑。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的 6 件 Da 型易形制比较清楚,其嘴两侧和双角之下都有长方形穿孔,而背面无横梁或钮,因此我们结合铜易的装配方式判断,其也应是通过钉孔装配的。有横梁或钮的一类与之形制接近的可能并非易。如殷墟西区 M701 就出土有一件这样的兽面形饰,由于出在殉葬人的颈部,所以简报推测为人面具^[19]。滕州前掌大墓地出有这样的兽面饰 45 件(图三 1),分别出自 4 座墓葬和 1 座车马坑。一些出土时背面还留有黑色碳化物,推测为炭化的皮革一类衬托物的痕迹。这些兽面饰的耳与鼻间或耳与角间都连铸有横

梁,根据种种迹象,原报告推测为铜胄上的饰件^[20]。1973年冬发掘的岐山贺家村M1也出土一件形制相同的器物,不同的是背面为钮。由于殷墟侯家庄商王陵中的M1004大墓出有儿件基本完整的铜盔,其正面顶部均为兽面形饰^[21],因此,这类背面有横梁或钮的兽面形饰很可能是胄饰一类的东西。Db型易集中出土在城固、洋县一带,此外仅西安老牛坡出土过3件。还有一种人面形铜饰,与D型类似,在城洋地区和琉璃河M1193等均有发现,但是此类既无自铭,也无考古迹象可以佐证(图三2),因此,结合其眼部有孔等形制特征推测为面具的可能性更大。



图三 兽面形铜胄饰、铜面具形制图

1. 滕州前掌大 M40:13 2. 城固 1976CHBSXT: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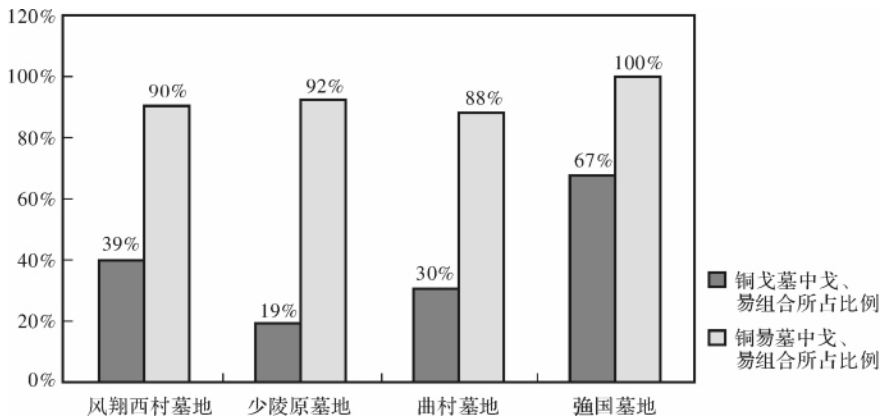
三、铜戈易的组合

我们在全面地搜集了出土铜易的墓葬,并分析了形制特征后,注意到一般情况下铜易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与戈构成一组基本的兵器组合。迄今发现的完整且未被盗掘的先周至西周早期墓葬中,只有凤翔南指挥西村80M45、西安少陵原M127、崇信于家湾M2、洛阳北窑M451和浚县辛村M72五例只出铜易,其余均有铜戈及其他兵器一起出土。为了更好的揭示这一现象,我们试举几个墓地做一简单分析。

凤翔南指挥西村曾在1979~1980年连续发掘两次,共发掘210座周墓。这批墓葬不仅极少被盗掘,而且时间从先周一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在发表这批墓葬的简报后面附有整个墓地的墓葬登记表,通过统计我们发现,该墓地出土青铜

兵器的墓共26座,除一座被盗外,其余25座里有23座随葬铜戈。其中,有9座是铜戈与铜易共出,占出铜戈墓的39%。在10座出铜易的墓中,有90%是与戈共出,且基本上都是随葬1件戈、1件易,再无其它兵器。少陵原墓地2004~2005年期间共发掘西周墓葬429座,从周初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早段。整片墓地只有少数被盗,在关中地区实属不易。该墓地未被盗掘的墓葬中有64座出土铜戈,其中12座出有铜易,占出铜戈墓的19%。而在未被盗掘且出铜易的13座墓中,只有1座未出铜戈,戈、易共出占出铜易墓的92%。此外,还有4座墓虽遭盗掘,但是均有铜戈和铜易共出。曲村墓地1980~1989年间发掘时还基本未见盗掘现象,墓地时代横跨整个西周时期。该墓地出铜戈的墓共23座,共出铜易的7座,占出土铜戈墓的30%。出铜易的墓8座,除1座与镞共出且时代为西周晚期外,其余均与戈共出,较大的几座墓还共出有矛、剑或镞,戈、易共出的比例占出铜易墓的88%。宝鸡渔国墓地保存较好,高等级墓葬较多,时代集中在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偏早。该墓地出铜戈的墓15座,仅有1座被盗。其中共出铜易的10座,占出土铜戈墓的67%。出铜易的墓10座,均共出有铜戈。墓葬规模较大的墓中还共出有矛、戟、剑或镞,等级最高的獭伯墓还共出旄、钺等。

我们选取的以上墓地保存状况较好,较少被盗掘;时间从先周到西周,时代跨度长;从地域上讲既有王畿内的墓地,又有诸侯国的墓地;等级上既有小墓,又有高等级的贵族墓。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余的几个墓地,如洛阳北窑、浚县辛村墓地等被盗多比较严重,组合情况理应



图四 铜戈、易组合比例图

和以上墓地差别不大。从以上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在出土铜戈的墓葬中,未必都出土铜易,但是在出土铜易的墓葬中,基本都共出铜戈。商周时期出兵器的墓葬一般都是男性墓,这样的组合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性墓随葬兵器的组合情况。再从时间和墓葬规模上观察,从先周到西周,从面积只有 1.14 平方米的小墓,到 44.1 平方米的相当于诸侯一级的高级贵族墓,均是这种组合情况,唯一的区别就是小墓只随葬戈、易,大墓还共出有其他兵器,但是戈、易的组合居于重要地位。另外,高等级的铜戈墓在西周时期戈、易组合的比例明显要高于低等级的墓葬^[22]。

至于城固、洋县地区出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 C 型和 Db 型易,我们推测 C 型易可能是与该地区多见的三角援戈组合,构成一对实战型组合;而 Db 型易可能是与之共出的当地另一种极具特色的弯形器相组合。城洋地区出土的这类弯形器数量不少,而且大小有别,齿牙多少也有所不同,显然不同形制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同时,这类弯形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均未开刃,不可能是实战的兵器。而 Db 型易也形制特别,显得比较肃穆。因此,我们推测 Db 型易与弯形器构成的组合可能主要用于礼仪活动。再加上当地出土的人形面具,正好构成一套礼仪组合。

四、铜易的分布、族属和流行时间

铜易在兵器中不仅与戈构成一对基本的组合,而且分布还有一定的变化。

目前所见先周时期的 A 型易基本都出于岐山贺家村、凤翔南指挥西村、西安老牛坡这 3 个地点。1973 年发掘的 10 座贺家村墓葬中, M1 出土铜鼎、簋、卣、甗 5 件礼器。从器型看,这 5 件没有一件能晚至西周时期,而且该墓出土的菱格尖刺状乳钉纹鼎、簋都是先周铜器的风格,因此该墓的年代应当在先周晚期。该墓虽然遭到盗扰,但是出土有 Aa 型易 1 件和戈 3 件。此外,在这一年发掘的另外 2 座小墓,分别出有 1 鬲、1 戈、1 易。这 2 座墓出土的陶鬲 1 件为高领袋足鬲,1 件为横绳纹鬲,都是先周晚期的器物,因此这 2 座墓的时代也在先周晚期。凤翔南指

挥西村出铜戈和铜易的 3 座墓,简报也都定在了先周时期。老牛坡 86XLⅢ 1M41 原报告将其划分到了老牛坡第四期商文化,即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张天恩在对老牛坡遗址进行重新分期后,将 M41 定在了殷墟文化第三期^[23]。总之,该墓的时代相当于先周晚期并无疑问。

C 型易在商代晚期主要集中在城固、洋县,而且出土相当的数量。其他地区仅见于老牛坡 86XLⅢ 1M41 和淳化黑豆嘴 M1。前者已论时代属先周晚期,出土铜易形制也与城洋的相同。后者的年代简报定在了商代至西周初期,从简报中介绍的金耳环等看,在商末的可能性要大些。该墓出土的铜易边沿较窄,中部呈一个较缓的隆起状,形制与城洋地区的有所不同。从该墓中出土的刀、削等都具有北方因素分析,以及平谷刘家河圆形圆顶易^[24]也是沿较窄的特点看,这件 C 型易可能同时受到城洋地区和北方因素的影响,是两种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Db 型易在商代晚期主要集中出土在城固、洋县,数量较多。其他地区只有老牛坡 86XLⅢ 1M41 和 86XLⅢ 1M10 分别出土有 2 件和 1 件。这 2 座墓的时代基本相同,出土的 3 件铜易的形制与城洋地区的完全相同。86XLⅢ 1M41 出土的不仅是 Db 型易, C 型易和铜面具也与城洋地区一致。因此,它们应当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并非老牛坡地区的特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先周时期 A 型易在周原地区出土最多^[25],最西到凤翔南指挥西村,最东到关中东部的老牛坡。C 型易和 Db 型易都是城固、洋县的地方产物,也只是在先周晚期才传到老牛坡。而需要特别注意的 A 型易,在先周时期仅局限在关中地区,东不过老牛坡遗址,在大片商文化分布区内不见^[26]。殷墟可以说是商周考古开展最早,也是工作做得最多的地区,从上世纪前半到现在已有 80 多年的工作历史。解放前发掘的晚商墓群有小屯墓地^[27]、侯家庄墓地^[28],大墓有侯家庄商王陵^[29]。解放后发掘的墓群有大司空村墓地^[30]、殷墟西区墓地^[31]、郭家庄西南墓地^[32]、花园庄东地墓地^[33]以及妇好墓^[34]等等,然而在这些墓葬中虽然发现有大量的铜泡,有的大铜泡直径也达到了 8 厘米左右,甚至有平沿,形制与 A 型易非常接近,但是这些

铜泡背面不是有一道横梁就是有十字横梁,亦或背面有钮,均不同于我们讲的铜易。在侯家庄商王陵的 M1003、M1500 中还发现有包金铜泡,但是这些直径也都在 3 厘米左右,背面均有横梁,都是车马器的一类。总之,在关中地区,特别是贺家村小墓中常见的 A 型易在殷墟却未见一件。不唯殷墟如此,在整个商代晚期商文化的分布区内也均如此。如:山西灵石旌介商墓均有戈、矛等兵器出土,却不见一件铜易^[35];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时期墓葬,除出土大量戈、矛等兵器外,还出有大量铜泡,但是这些铜泡均与殷墟一样,体型较小,且背面都有横梁或钮,都是车马器;在山东苏埠屯已发表的材料中也有圆形带梁、带钮小铜泡以及兽面形铜泡,但未见有铜易^[36]。因此,A 型易在先周时期集中在以周原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东不过老牛坡遗存分布范围,显然是以周人为核心的西土集团的产物。

然而在进入西周之后,铜易的分布范围却迅速扩大。此前城固、洋县地区多见的 C 型易和 Db 型易消失,只有人形面具在琉璃河 M1193 中有出土。所以说,城洋地区出土的这两类铜易只是此地的地方特色,在商代晚期对周边还略有影响,进入西周之后就基本消失。Da 型易在鹿邑长子口墓、浚县辛村墓地以及宝鸡虢国墓地 BRM1 乙中有所发现,但是都出于高级贵族墓,一般贵族和平民墓不见。本文重点讨论的 A 型易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在周人故地,这类铜易进一步稳步发展,在以上提及的岐山贺家村、凤翔南指挥西村西周墓中均有发现,且与戈构成基本组合,许多小墓随葬铜器都是一戈、一易。铜戈、易的组合在北吕墓地^[37]、少陵原墓地中小型墓中也都常见。在偏西的宝鸡斗鸡台^[38]、崇信于家湾,偏东的华县东阳中小型墓也有大量出土,组合关系稳定。在商代晚期周人未控制的地区,包括商王朝管辖或不管辖的地区,随着周初的分封,铜易开始大量出现。如:在原接近商王朝腹地的洛阳北窑墓地虽然被盗严重,但是在西周早期中小型墓葬中,多达 39 座墓出土有铜易,且基本都与铜戈共出,占到了总共发掘的西周早期墓葬的 34%。若考虑到近半数不出兵器的女性墓葬,男性墓中的比例可能达到 60% 以上。在早商都城所在地郑州,1999 年发

掘的一座西周早期偏早的墓中也出土 Aa 型易,且与铜戈共出^[39]。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处晚商商王朝王都所在地的殷墟刘家庄北地墓地^[40],晚商时期不见铜易的发现,但进入西周后,有了 Aa 型易的出现。又如:曲村墓地发掘的中小型墓葬中,有 8 座墓出有 A 型易且均未被盗,其中 7 座都是铜易与戈配套,较大的墓还同出有剑、矛、镞。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和琉璃河燕国墓地^[41]也是如此,特别是燕国,在周王朝封国中位置最偏远,在商代晚期属于圉坊三期文化,并非商王朝控制的地区。但是在一进入西周之后,中小型墓中开始随葬铜易。以上都是中小型墓葬的情况,而相当于诸侯一级的大型墓葬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浚县辛村的卫侯墓、琉璃河 M1193 燕侯墓、鹿邑长子口墓、山西翼城大河口 M1^[42]中,虽然相当一部分遭到盗掘,但是均出土有铜易,而且很多盾饰的形制更复杂。在浚县辛村卫侯墓中,“出土有大型圆甲泡数个,泡外圈一大圆环,环外突出三个长方形铜片作等距离的分布……”^[43]这里讲的甲泡就是我们说的 A 型易,大圆环就是铜易外面的环形饰,即 B 型易。翼城大河口 M1 出土的铜易也是此种形制。与之类似的在宝鸡虢国墓中发现多件,而且出土迹象非常明确,就是 B 型易在外, A 型易在内,然后一同钉在漆木盾上,只不过没有环形饰外面的长方形铜片而已。这种铜易装配方式更为复杂,可能代表的级别也更高,而出土的墓葬规格正说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西周早期随葬铜易以及戈、易组合的中小型墓葬基本上没有腰坑和殉人看,随葬 A 型易以及戈、易组合在以周人为核心的西土集团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从周初开始,这种现象已经不限于西土集团的墓葬所独有。随着周对商王朝征服的完成,西土集团的文化因素开始向原商王朝的腹地以及周王朝新分封的地区渗透,一些诸侯一级的大型殷遗高级贵族墓也开始受到影响。如鹿邑长子口墓,该墓有腰坑以及大量殉人、殉狗,属殷遗墓无疑。出土的陶器是周初风格,墓葬年代在周初已成学界共识。但是,该墓出土有 2 件 A 型易和 6 件 Da 型易,显然是受到西土集团因素的影响^[44]。类似的还有彬县断泾 M4,该墓为一座大型竖穴土

坑墓,墓室面积达到了23.5平方米,同样有腰坑和殉人、殉牲^[45]。该墓很可能也是一座殷遗贵族墓葬,不同的是可能为周初被分散到关中的殷遗的一支,墓葬的时代应当已经进入了西周^[46]。该墓出有A型易4件,由于被盗严重,共出的兵器只有7件铜镞。因其处于周人故土,可能更容易受到西土集团因素的影响。在大型墓之外,中型的贵族墓也有A型易的出土。琉璃河I M52为一座中型墓,墓葬的南二层台有一殉人,是否有腰坑,从墓葬的保留情况已难判断,但是从该墓分布在琉璃河墓地I区,特别是墓葬出土的铜鼎、尊均有族徽“鬯”看,此墓属殷遗无疑。该墓出有A型易1件,而且有铭“匱侯”二字,可能是生前燕侯赏赐之物,死后葬入墓中。此墓的年代在西周早期偏晚。另外还有一座带腰坑且出土A型易的小墓,为少陵原M134。该墓随葬一戈、一易,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早。可见,自西周初年开始,殷人墓葬也受西土集团文化因素的影响,开始随葬铜易。然而A型易在经历了西周早期的繁荣,在进入西周中期后,分布范围虽然没有明显缩小,但是数量有了明显的减少^[47]。如洛阳北窑墓地,西周早期出铜易的墓还占到所发掘西周早期墓的34%,而到了西周中期比较明确出铜易的只有M307、M393两座^[48]。仅有王畿内的少陵原墓地还发现较多,有M75等6座,但是这个数量已远远少于该墓地出铜易的西周早期墓。其他地点如岐山贺家、扶风北吕、曲村、浚县辛村、凤翔南指挥西村发现的数量都是小于2座^[49]。而到了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A型易开始趋于消失,除曲村M5189、平顶山应国墓地M8^[50]和三门峡虢国墓地^[51]有所发现外,其他地区基本不见。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先周时期,A型易和戈、易组合主要存在于关中西部以姬姓周人为核心的西土集团内部,老牛坡晚商遗存应是受其影响,其分布没有跨过关中东部。然而从周初开始,随着周王朝对商王朝故土的占领,以及分封诸侯对于新的国土的经略,在此前这些地区不曾出现的A型易和戈、易组合开始随着周人的

占领而出现,甚至殷遗贵族也开始受到影响,随葬这类铜易。但是在经历了西周早期的繁荣之后,A型易在西周晚期又基本消失。以上是我们发现的一种特别的考古现象,透过这种现象,似乎可以揭示出三点规律:其一,A型易以及戈、易的组合发生在以先周文化为主的关中地区,其是以姬姓周人为核心的西土集团的铜器;其二,它的主要流行时间在西周早期,西周中期明显减少,到了两周之际基本消失,其时代性在考古学文化中有断代意义;其三,一旦A型易和戈、易组合在关东地区出现,就意味着该地区该类遗存的年代已经进入西周,因此A型易在关东地区的出现,可以作为商周分期断代的一个标尺^[52]。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反复提到一个“西土集团”的概念,用以代替“姬姓周人”,这是因为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讲,联袂鬲与高领袋足鬲何为先周文化尚有争论;此外,文献中姬姓周人也自称为西土之人。而A型易正是先周时期西土集团铜器的一种,戈、易的组合也是西土集团铜器的一种组合风格。而在A型易之外,在先周时期西土集团也拥有其他的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铜器,前人也曾做过一些开创性的研究。邹衡在《论先周文化》一文对先周文化的铜器做了系统的研究,他将先周文化铜器分为商式铜器、商周混合式铜器、周式铜器三大类,辨识出了方座簋、戈戟、歧形当卢、迂旋卷尾夔纹等一批先周时期西土集团的铜器和装饰纹样^[53]。日本学者武者章在《先周青铜器试探》一文中重点讨论了先周时期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附近的斜方格乳钉纹簋,特别是一类乳钉为尖刺状的斜方格乳钉纹簋,将其认定为当地土著系统的青铜器^[54]。而在两位学者讨论之外,长武碾子坡一座铜器窖藏出土有2件红铜鼎^[55]。由于该窖藏出有乳状袋足鬲等陶器残片,时代也应当是先周时期的。这2件铜鼎制作粗糙,铜质与同时期殷墟铜器迥异,因此,我们推断这2件铜鼎乃是先周时期西土集团之物。武者章所讲的尖刺状斜方格乳钉纹簋的器型仍是典型的模仿商式陶簋,西土集团只是在其上改进了装饰纹样。而扶风五郡西村窖藏出土的2件铜簋^[56]乃是典型的周式陶簋^[57]的造型。此外,与之同出的2件大口尊也可能是对周公庙一带出土的陶大口尊^[58]模仿的产物,

它们都应是西土集团的铜器。此外,邹衡提到的戈戟、歧形当卢等在先周时期多见于关中地区,进入西周分布范围才进一步扩大,它们同样可以作为商周分期断代的一个标尺。

从以上先周时期西土集团的铜器讨论中,我们发现此时西土集团的铜器有一些是别具自身特色的,应当是西土集团因素的集中体现。而有的则吸收了一些其它文化的因素。如上述的铜戈戟,韩金秋就认为是周人长胡戈和黑豆嘴类型无孔长体刀的融合体^[59]。而我们知道,黑豆嘴类型本身就具有很多北方文化因素。其实目前所见商代最早的圆形圆顶铜易就见于北方地区。在朱开沟遗址的 M1040 中出土 3 件铜易,1 件为 A 型易,另 2 件与之类似,区别在于 1 件顶部斜收为尖状,1 件为弧方形。该墓报告中划分在第五段遗存,时代约相当于商代中期^[60]。此外,1977 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发现的一座商代中期墓中也出有 3 件 A 型易,只是边沿较窄。前者墓葬属朱开沟文化无疑,后者属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是围坊三期文化虽有争议,但是该墓不属于商文化是大家的共识。因此两者都是北方文化系统的。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目前可以确认的先周时期西土集团的铜器墓葬很少,而且不见大墓,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可能会有更多更早的 A 型易的发现。另一方面,先周铜器中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北方因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于今后材料的丰富与进一步研究^[61]。当然,比前文所论更早的铜易,早年也有发现,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相当于二里头三期的墓葬中就出土有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一件铜易(VIKM3:9),并与铜戈共出^[62]。但由于一来时代上与先周跨度较大,二则中原地区整个商代均不见铜易的发现^[63],因此其与先周时期西土集团铜易的关系可能不大。而以上所涉及的有关铜易起源的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但是,我们在前文总结出的铜易和戈、易组合在族属以及商周断代上的标尺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本文从选题到写作均是在刘绪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谨致谢忱!

考古,1975(5)。b. 成东. 先秦时期的盾[J]. 考古,1989(1)。c. 刘昭瑞. 说钺[J]. 考古,1993(1)。d. 何弩,罗明. 两周大武舞道具考略[J]. 考古与文物,2005(5)。e. 王恩田. 释易[C]// 陕西师范大学,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 北京: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f. 曹玮. 商周时期的圆形盾易[C]// 曹玮. 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四). 成都:巴蜀书社(待出版)。g. 王志友,赵丛苍. 论城洋铜器群中青铜泡、人面与兽面饰及弯形器的用途[C]// 西部考古(第三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少陵原西周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以下凡涉及该墓地墓葬的情况,如无特别说明,均指该报告。以下引用的简报或报告均如此,不再加注特别说明。

[3] 卢连成,胡智生. 宝鸡燕国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4] a 曹玮. 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M]. 成都:巴蜀书社,2006。b 赵丛苍. 城洋青铜器[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第十八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7] 注[1]中的诸位学者已经论述,如“卫师易”、“燕侯舞易”等等,此处不赘。

[8]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J]. 考古,1976(1)。

[9] 同[3]。

[10] 雍城考古队.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J]. 考古与文物,1982(4)。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华县东阳[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2] 即我们所说的车马坑。

[13] 石璋如. 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 北组墓葬[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14] 同[3]。

[1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北窑西周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 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J]. 考古,1990(1)。

[17] 淳化县文化馆. 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 考古与文物,1986(5)。

[18] 刘士莪. 老牛坡[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79(1)。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滕州前掌大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1] 梁思永,高去寻.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004 号大墓[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1] a. 晏琬(李学勤). 北京、辽宁出土青铜器与周初的燕[J].

- [22] 由于目前所发现的先周时期的墓葬基本为小型墓,所以先周时期墓葬是否也与此一致暂时无法下结论。
- [23] 张天恩. 关中东周文化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24]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J]. 文物, 1977(11).
- [25] 除我们以上列举的3座贺家村墓葬外, 1976—1978年发掘的贺家村墓葬可能也有, 从发表的有限的陶片照片看, 有的墓葬可能早到先周晚期。这批墓葬中戈、易组合的墓葬多见, 由于简报只发表了墓葬登记表, 而没有发表器物图, 所以我们没有详述。内容可见: 陕西周原考古队. 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发掘报告[C]// 文物编辑委员会. 文物资料丛刊(8).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 [26] 我们认为老牛坡晚商时期的遗存不属商文化, 详细可看: 刘绪. 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C]// 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
- [27] a. 石璋如. 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 北组墓葬[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b. 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 中组墓葬[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2. c. 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三 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3. d. 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四 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6. e. 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 丙区墓葬[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0.
- [28] 石璋如.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小墓分述之一[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1.
- [29] a. 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001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b.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002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5. c.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003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7. d.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004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e.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217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8. f.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500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4. g.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550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6. h.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129 1400 1443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6.
- [30]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J]. 考古, 1964(8).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94(4).
-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9(1).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3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灵石旌介商墓[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36] a.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J]. 文物, 1972(8). b.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C]// 张学海.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c. 夏名采, 刘华国. 山东青州市苏埠屯墓群出土的青铜器[J]. 考古, 1996(5).
- [37]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 北吕周人墓地[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 [38] 苏秉琦. 斗鸡台沟东区墓葬[M]. 民国37年.
- [39]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市洼刘村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发掘简报[J]. 文物, 2001(6).
-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J]. 考古, 2005(1).
- [4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5.
- [42] 谢尧亮, 王金平.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C]// 国家文物局. 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 [43] 郭宝钧. 浚县辛村[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
- [44] 由于燕国墓地的族属问题尚有争论, 虽然多数认为地方特色明显, 可能并非周人墓地, 但是仍有学者认为其是周人的墓地。因此, 此处暂且不论。
-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 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99(1).
- [46] 该墓简报划归为断泾商代二期遗存, 年代估计约与迁岐前后的先周文化相当。有学者研究, 商因素在关中的再度出现, 标志这些遗存年代已经进入西周。因此, 断泾M4的年代当为周初。详细可见: 刘绪. 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C]//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
- [47] 从西周中期开始, 其他一些青铜兵器也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 [48] 报告中Ⅲ式铜泡13件, 所列标本中有2件是Ab型易, 另2件为带梁的铜泡, 其余9件情况不明。此外, 24件I式泡也未做介绍, 是否与报告西周早期I式泡相同不明。
- [49] 这里指墓葬时代清楚, 且出土的铜易有图片、线图或文字说明, 确为我们所论证的A型易。
- [5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 2007(1).
- [51]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上村岭虢国墓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c.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

- 所. 河南三门峡李家窑遗址西周墓的清理[J]. 华夏考古 2008(4).
- [52] 我们以上分析的商代晚期商王朝统治的地区以及卫国、晋国、燕国这些新分封的诸侯国的情况都支持我们所揭示的规律。因此, 我们推测南方和山东地区古国的情况也应如此。
- [53] 邹衡. 论先周文化[C]//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54] 武者章. 先周青铜器试探[J].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989(109).
-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邙州·碾子坡[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7.
- [56]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扶风县博物馆. 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J]. 文物 2007(8).
- [57] 这种形制的陶簋从先周时期一直使用到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在此之后器腹越来越浅, 开始接近豆形。
- [58] 类似的陶大口尊虽然在曲村、浚县辛村都有出土, 但是周公庙一带出土最多, 而且相对集中。
- [59] 韩金秋. 夏商西周中原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9.
- [6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 [61] 虽然两墓的时代早于目前所见关中地区的铜易, 但是北方地区此时期的铜易一是发现的单位少, 二是与两墓铜易相组合的兵器, M1040 为铜戈, 刘家河墓为铁刃铜钺, 均是中原式的。因此还不能据此断定先周文化铜易是受到北方文化因素影响而出现的。
-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 [63] 1995 年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工作中, 在灰坑中曾发现 2 件圆形铜泡, 形制与 Aa 型易接近。但是该铜泡直径仅 4.8 厘米, 远小于本文所论铜易, 且中原地区整个商代墓葬发现很多, 均不见铜易的发现。因此, 这 2 件铜泡可能并非盾易, 故本文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责任编辑 李自智)

(上接 31 页)

- [32] 李学勤等.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33] 孙森. 夏商史稿[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 [34] 郑杰祥. 夏史初探[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 [35] 同[26].
- [36] a. 同[24]. b. 果美侠, 李维明. 夏年新证[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2).
- [37] 同[24].
- [38] 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C]// 方诗铭, 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00—215.
- [39] 此种情况可参见: 王宇信, 杨升南, 聂玉海. 甲骨文精粹释译[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138—1139.
- [40] 此种情况可参见: 高明, 涂白奎. 古文字类编(增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468.
- [41] 同[23]a.
- [42] 同[23]a.
-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 1965—1981[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73.
- [44] 徐旭生. 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 考古, 1959(11).
- [45] 丁山. 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J]. 国立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 1 分册), 1935: 90.
- [46] 史念海. 中国古都和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43.
- [47] 同[24].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J]. 考古, 1981(5).
- [49] 赵芝荃. 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C]//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50] a.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 1999 年试掘简报[J]. 华夏考古 2000(4).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 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 2000 年发掘简报[J]. 文物 2004 年(3).
- [51] 赵春青. 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J]. 中原文物 2002(1).
- [52] 靳松安. 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及其相关问题[J]. 中原文物 2010(1).
- [53] 同[11]b.
- [54] 靳松安. 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整合[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122.
- [55] 同[54].

(责任编辑 李自智)

本期要览

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

泰陵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陵园,2008至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泰陵陵园遗址展开了全面考古勘探,并对陵园东门门址、陵园东南角阙、西侧蕃酋殿进行了发掘。通过勘探和发掘,摸清了陵园遗址的范围、分布和具体建筑基址的规格、形制,为更深入研究唐代陵寝制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商周铜易研究

铜易是一种通过沿面上的钉孔装配在漆木盾上的一种器物。本文通过对铜易形制、组合、分布、族属、流行时间的分析,揭示圆形圆顶易以及戈、易的组合发生在以先周文化为主的关中地区,主要流行时间在西周早期,到了两周之际基本消失,进入西周后其在关东地区出现。这可作为商周分期断代的一个标尺。

关于968年京兆府国子监里的《佛道图文碑》

作于北宋初期并置于京兆府国子监的《佛道图文碑》集佛教和道教经文于一体,还有难得的卷首线刻图,并有赞助者和作图者名录。本文通过辨识图像内容及其与经文的关系,着重于图像研究,分析画像中有意味的细节,体察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图像变化和历史意义。

藏传佛教美术中多闻子图像及其信仰——以夏鲁寺为例

藏传佛教美术中的多闻子图像是一个丰富的图像系统,其形成、演化复杂。夏鲁寺现存44个建筑空间中有多处出现多闻子图像,不同建筑空间的多闻子像特征也不尽相同。本文以其他地区的多闻子图像为参考,分析此类图像特征之间的差异,对多闻子图像的演变及其在不同佛教地区的传播作一探讨。